

现代思想译丛

# 世界政治

*World Politics*

[英] 詹姆士·马亚尔 著  
胡雨潭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主编 吴 源  
策划 佘江涛

现代思想译丛

*World Politics*

# 世界政治

---

[英] 詹姆斯·马亚尔 著  
胡雨谭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政治 / (英) 马亚尔著; 胡雨潭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7

书名原文: World Politics

ISBN 7-214-03392-5

I. 世... II. ①马... ②胡... III. 国际政治

IV. D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45571号

**World Politics**

Copyright © James Mayall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rights © 2003 by JSPPH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olity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Blackwell Publishing Limited,

Oxford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0-2003-40号

书 名 世界政治  
著 者 [英] 詹姆斯·马亚尔  
译 者 胡雨潭  
责任编辑 余江涛 周晓阳  
责任监制 蒋子平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165号 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南京中央路165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常熟兴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5 插页 4  
字 数 80千字  
版 次 2004年1月第1版 2004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3392-5/D·547  
定 价 11.00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 序 言

眼下,质疑新千禧年的重要性可谓正当时。当下统治着我们生活如此之多方面的计算机技师们用堪称表率的高效率完成了工作。那些害怕千年大灾难而躲藏起来的人其实不必多此一举。当庆典垃圾被清理过后——仅仅伦敦街道上就清出20吨空香槟酒瓶子——世界看来和前一晚无甚差别。人类的问题及其前景原封不动。

不过,千禧年仍旧不失为一个观察世界大势的好出发点。我们只有借助日历,才能对人类的问题及其前景进行清楚的描述。在大多数文化中,人们都在固定的时候进行庆典活动。同样,在大多数文化中,那些能够借助星辰或者某种数字技巧运用日历的人都得到尊奉,这也许是因为我们私下里都渴望一瞥我们的命运之故。从裘利斯·恺撒到英吉拉·甘地、罗纳德·里根,统治者们都像其他人一样乐于向占卜者求教。不过,我们需要日历还有其世俗原因。如果没有日历,我们就难以组织我们的社会生活和私人生活,就像我们如果没有道路就难

以四处走动,没有房子便没有了栖身之处一样。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心安理得地把千禧年用做研究国际社会的现状及发展的出发点。

不过,我们也不妨承认,这个不错的出发点存在一个问题。对现代世界而言,千禧年是一个颇为暧昧的象征。一方面——在西方思想中——它与热情的政见(*politics of enthusiasm*)联系在一起,象征着人们对于一个复乐园般的重生世界的渴望,这个世界将被建立在公正原则之上(这些原则不知何时已经失落或者遭到背叛)。在另一方面,千禧年也是西方的普遍主义或者狂妄自大的标志(这要看从哪一个角度来讲而定)。诚然,可能除了佛教以外,各大世界宗教都关注千禧年,这些关注都是由对于一个理想社会的渴求所引发的。但是,世界本身是基督教故事的一个部分。出于实用的目的,世界按照基督教的纪年方式被组织为——约束为——一个单一的世界共同体。

因此,千禧年对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提出的问题大致如下。假如从比较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待国际关系,人们有可能从中识别出社会和宗教的不同行为模式。分析这些模式毫无疑问将有助于解决我们共同的困境,但代价是使生活失去其激情和戏剧性。就这一点而言,叙述的地位无可取代。然而,如果我们关注的是过去2000年的故事,那么我们就必须认识到,它

与世界上许多民族并没有深刻的精神联系,而且,它也不可能在各处都长盛不衰。实际上,这个故事的一个方面——即它可以被用来演示西方文明和价值观的优越性这一点——看来倒是有可能激发反西方的千禧年大举动。我们就算不接受亨廷顿教授关于冷战后将是各种文明的冲撞的理论,也能预见这些大举动有可能矛头直指在西方扩张阶段中形成的国际社会的结构和惯例。实际上,情况已经如此。

热情的政见有其民间版本,也同样有其知性变体。千禧年想必也会成为学术界的解构对象。关于西方和世界并非同义地发现已经带来了广泛的理性及政治后果。17世纪和19世纪期间,当世界被合并为一个单一的经济政治体系时,那些促成此局面的人——哲学家、科学家和帝国缔造者们——很少操心文化或者其他相对主义的问题。开始时,他们对世界持有简单的重商主义态度,认为世界无非有赢家和输家之分。根据这种观点,贸易和战争仅有程度之差。后来,他们发展出一种普遍人类理性观点。在经济学中,理性主义者试图证明通过谋利动机和开放竞争的结合,邪恶可以被转变为美德。在政治学中,他们发现存在特定的、所有人生来俱有的权利,而且这些权利与单纯的特权截然不同。

这些发现使得一种理性主义的双赢世界观取代了先前的现实主义的零和的普遍主义。从前,人们认为一个个人或国家

的所得意味着另一个人或者国家的所失，但现在根据这些新的学说，双方不必同样有所得也都能变得更加富裕。这种世界观对合作作出了解释，也奠定了一种关于社会进步的世俗意识形态的基础。它还提出了一个难题。在一个由拥有同样的基本权利（包括个人和集体的自决权）的主权国和平等的人类构成的世界上，我们如何解释（更不用说如何为它正名了）这个事实：一些强国已经有效地包围了世界并在其中瓜分了它们的势力？两个其竞争最终导致了上述包围行动的国家——英国和法国——分别是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的发源地，因此也是理性主义普遍主义的起源，这一事实使得这个难题变得更加复杂。

这个难题从未得到解决。最终，人们认识到它是不可解答的。在部分程度上，这促成了欧洲帝国主义力量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撤退。但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进化理论帮助了那些希望利用进步学说捍卫西方的支配权的人。根据这些人的看法，欧洲帝国主义是未来的世界文明的化身。在二战的可耻暴行面前，社会达尔文主义宣告破灭，至少它没能成为对于文化统治的体面辩解。不过，二战之后，几乎紧接着就出现了冷战，它使得国际政治讨论极大地忽视了另一些价值体系以及它们的存在表明的文化相对主义。只有在1989年之后，世界政治研究才开始积极关注我们现有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格

局缺乏令人信服的认知基础 (cognitive foundations) 这一事实。

反基础主义——即一种认为没有什么牢固的事实或者真理的基础支撑着我们对于世界的认知的观点——在早些时候已经影响了人类科学的许多领域；但是，在这个方面，就像在其他方面一样，国际政治研究仍旧由于核僵局固有的危险而与时代脱节，没有受到各种知性潮流的影响。不过，世界政治研究本应该及时关注到这一观点，这一点仅仅以下事实就足以说明了：国际政治中的偶然性一向使得个体政治家所持的任何信念实际上都难以得到普遍认同。国际关系中的共识基础都是临时性的，是艰苦卓绝的谈判的结果，总归要遭到修订。国际法的基本原则——“有约必守” (pacta sunt servanda)——由其附加条件——“情势不变” (rebus sic stantibus) 所限定。

这些事实也许意味着，对国际关系这个领域可以使用各种后现代分析手段。故事可以从各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来加以讲述，以至于没有哪一种版本可以确立明确的权威。这些故事不仅是同样有效的，而且它们都不具备基督教或者伊斯兰教一度提供过的那种元叙述。换言之，不存在什么可以使千差万别的人类经历变得整齐划一的普适方案。

本书的论点是，遵循这条逻辑路线既危险又没有必要。千禧年的热情在政治上是危险的，因为它能够轻易地转变为狭



隘的排他主义和/或者侵略性的仇外态度。它的理性对应物——任何可以被称做相对主义的东西——则出于同样的原因也是危险的：一方面，它将一小队鉴定家从我们当中划分出去；另一方面，由于他们认为除了主观经验之外，其他均不值一提，因此他们随时有可能听命于任何政治操纵者。

认为对旧世界加以解构会使人类处境得以改善，这种想法颇为荒谬。何以见得？假如回答是只有揭露经济政治体制的腐败，我们才可能建立一个公正的世界秩序，这只是老生常谈。许多自由主义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很早以前就得出了这个结论。我们应当向后现代主义者们（正如向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一样）质询新秩序将根据何种原则建立。如果认为答案是不言而喻的，那么这无异于在认同千禧年谬论的学术对应物。另一方面，假如回答是既不存在什么原则，也没有什么一致性，更没有任何在相互竞争的道德主张中作出选择的理性途径，没有什么固定之物，一切均飘忽不定，那么我们该如何开展讨论？实际上，这样一来，开展讨论的意义何在？

后现代的相对主义没有意义，因为它似乎打算宣称，一旦人类惯例的文化基础被曝光，它们就不可能存活下去，或者至少会失去权威性。没错，这些惯例的起源影响了它们随后的历史发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因此就不可能由外界影响加以修正。就本质而言，所有文化都是综合性的混合物。宗教基

要主义在许多国家的重新露头并不表明跨文化讨论和互相兼容是不可能的，或者知识不可能在发展出它的特殊环境之外得到运用。某些信徒试图在无视国际法规则的情况下动用武力的愿望，也并不能证明这些法则只能在西方文化中实行。假如文化与外界密封隔绝，现代国家将不可能演变进步，法律更是如此。

“在比利牛斯山脉这一面是正确的，到了那一面就是错误的。”帕斯卡正确地提出的是问题而不是答案。自1989年起，文化和政治分歧的问题在国际生活中已经重新浮出水面。它出现在三个关系密切、互有交叉的讨论中，这三个讨论构成了本书的关注焦点，即关于主权、民主和干涉的讨论。更准确地说，它们涉及的是主权的意义和适用性，以及它与国家身份和自决权原则的关系；关于民主应当成为世界秩序之基础的看法，以及这一看法必然的结论：民主化应当成为解决冲突的目标和主要工具；还有使用外部力量来阻止侵略以及解决国内冲突的可能性，以及认为应当用人道主义作为干涉理由的相关看法。在展开这些主题之前，我们也许有必要重新考虑三个在国际社会理论家的著作中已经被直接或者间接提出的问题（这些问题仍旧构成了讨论这些主题的背景）。首先，国际社会是什么？其次，谁是它的成员？第三，它的边界在哪里？为了对这些问题作出大致解答，我将在每个讨论开始之前先回顾

一下传统的看法,然后再转向它们的修正观点(在很大程度上这是20世纪的发展带来的)以及它们在冷战结束之后遇到的新挑战。

## 目 录

序言 1

### 第一部分 国际社会 1

- 第一章 起源和结构 1
- 第二章 国际社会的现代化 8
- 第三章 一种新的社会连带主义? 17

### 第二部分 主权 29

- 第四章 民族主义 29
- 第五章 自决权 44
- 第六章 重新评估 58

### 第三部分 民主 70

- 第七章 历史先例和文化前提 70
- 第八章 国际法和外交政策手段 84
- 第九章 重思多元论和社会连带主义 96

### 第四部分 干涉 111

- 第十章 自由主义国际理论中的干涉 111
- 第十一章 20世纪90年代的人道主义干涉 122

后记 138

## 第一部分 国际社会

### 第一章 起源和结构

国际社会的起源一般要追溯到基督教纪元的第二个千年的中期。欧洲宗教战争之后,外交和司法惯例增强了理性、利益和审慎在国际政治中扮演的角色,削减了激情的作用。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得出的这个结果是经谈判达成如下共识后取得的:从此,在其自己的领域内,主权应当被认为是权威的最终来源。“在谁的领地,信奉谁的宗教”(Cuius regio, eius religio)——其意大致为各个君主自定宗教——并不是关于宗教信仰自由的公告,但它是现代不干涉原则的前身。可以想见,如果没有它,就不可能出现普遍的国际合作体制。

宗教信仰不再被认为是引发战争的正当理由，至少在基督教国家之间是如此。在这个意义上讲，它们之间对彼此主权的相互承认不啻对人类千禧年冲动的一个打击。

在主权概念的基础上，国际社会的其他惯例也得到了完善，其中最著名的是外交惯例以及国际法框架。此外，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还另有三个互相竞争的领域——权力均衡、大国的特殊作用以及体系内的战争。

如果说传统的国际社会是和平条约的直接产物，那么从长期的角度来看，它也可以说是世界帝国思想的继承者。在这个思想背后，拖曳着罗马帝国的漫长影子，后者促成了关于一个联合一体的基督教世界的思想。这些思想倾向于维持社会和政治关系中的等级制度，因此也赞同各有区别却不乏重叠之处的管辖权。与封建制度相比，由主权国家构成的新的国际社会至少在理论上是遵从平等主义的。由于不同国家一如既往地力量和能力上有巨大差异，因此这样的问题难免要出现：有什么可以取代作为决定国家间关系之原则的等级制度？

大多数理论家的答案是权力的均衡，这种理论如此便于灵活使用，以至于它可以用来捍卫几乎任何政策。大量卷入“权力均衡”政治的主要是大国，它们在必要时不惜牺牲小国的利益，在竞争国中追求军事优势或是维持一种外交上的均衡。毕竟，只有这些国家才拥有将整个体系拽入大战的能力。

假如这种情况发生，包括从地方到国际领域的法律的整个大厦将受到威胁。大国被认为意味着责任。相应地，大国倾向于宣称自己拥有为了秩序的利益而践踏法律的权利。

因此，等级制度的原则尽管建立在不正当权力的基础上，却仍旧被偷偷塞回了国际关系当中。由于缺乏高踞于主权国家之上的权威，因此除了主权国家自己同意接受的那些制约条件之外，对于它们是否参加战争可谓毫无约束。这样，战争（正是它的破坏性后果导致了这种体系的建立）成为一种终极机制，其作用不仅在于解决利益冲突，而且也在于维持国际秩序。

这种对国际社会有点过分乐观的描述忽视了贯穿绘制主权国家关系图之企图的理性争辩。大多数作者已经就国际合作问题以及存在一个国际社会的可能性的问题分出了三种立场。他们的名称千奇百怪，但是可以很容易地被划分成政治现实主义、自由理性主义和革命派三种。对于现实主义者而言，国际社会并不存在，一切战争中惟一的制约因素是审慎的自我保护原则。对于理性主义者而言，国际社会存在着，但是它与国家的社会并不相同，不应当被施加以与后者一样的标准。对于革命派人士来说，国际社会只有在全人类的关系类同于国内政治时才存在。换言之，国际社会是一个国家，或者应当成为一个国家。

现代国际社会的理论家中最突出的两位——马丁·怀特 (Martin Wight) 和海德利·布尔 (Hedley Bull)——都谨慎地指出：他们的种种称谓只适用于理想典型，而在实践中，这些立场纠缠不清，难以分辨。因此，严格地说，它们并非泾渭分明，而是共存于任何时间段或者地点（实际上在任何个人的思想中也是如此），尽管可以公平地这样说：在某些时候，在某些地方，某种立场也许会占据上风，比如冷战期间，对垒双方都采纳了现实主义立场。对我们而言，值得注意的是，在多元论 (pluralism) 和社会连带主义 (solidarism) 之间存在着根本区别，足以划分这三种立场。所谓多元论，我指的是认为国家像个人一样，能够而且的确拥有不同的利益和价值观，因此国际社会应当只限于建立一个允许这些国家在相对和谐中共存的框架的观点。多元论者认为许多（如果说不是全部）冲突的价值观是可以在一个根据不加歧视的相对主义观点来认识它们各自的立场的框架结构中并存的。至于社会连带主义，我指的是认为天下一家，而外交的任务在于将这种潜在的或者直接的利益和价值观的一致性转变为现实的观点。对于多元论者来说，将国际社会与任何其他形式的社会组织区分开来的特征之一是它的程序，以及它随之具备的非发展 (non-developmental) 的特点。在另一方面，连带主义者则相信国际宪法的改革和趋同。只有那些最残忍和最顽固的革命派才不会认识



到这些关于合作的不同形式之间的动态冲突。20世纪出现过许多试图在国际水平上解决这种冲突的尝试。

在转向这些尝试之前，我想先简单地解释一下上文提出过的第二和第三个问题——谁是国际社会的成员？国际社会的边界是什么？在起初的概念中，关于成员的问题并没有什么质疑可言。国际社会是一个主权国家的社会而不是一个人的社会。尽管对于谁有权利运用主权以及在何种情况下它可以被回收这个问题还存在争论，但是作为个人的国民没有自己的国际权利可言。他们如果在一个国家里受到迫害，也许可以在另一个国家里寻求庇护——就像犹太人在英国受到克伦威尔的保护一样——但是他们能够这样做，是一种政治功能而非法律功能的结果。“在谁的领地，信奉谁的宗教”文如其意，说明应当由统治者决定他的臣民生活于其中的环境。在理论上，国内事务不属于国际政治范畴。从这种意义来看，国际社会是多元论的。实际上，在一战之前，鲜有对社会连带原则作出的让步。

起初的国际社会边界同它的成员差不多同样不容变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本身是在那些直接卷入三十年战争的国家之间达成的，但是它的原则在欧洲得到了普遍接受。非欧洲国家被渐渐接受进这个由国家构成的社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地缘政治的结果，也是强大的政治对手与奥斯曼帝国支